

# 论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

## ——以《自然地理学》为中心

钟仕伦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6)

**摘要:**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自然地理学》中。康德从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的人的种属特征、性格气质、生活习俗等视域考察了18世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在孟德斯鸠“人从属于自然和气候”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他的地域美学思想。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是他重视审美经验的前批判期美学向重视理性分析的批判期美学的过渡,也是他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阐释的受地理环境决定所形成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鉴赏的偏离”、鉴赏是“对普遍使感官满意的判断”的思想、山区气候和乡愁悲剧的关系等,为他的《判断力批判》奠定了实践经验的基础,而《自然地理学》也因此成为康德建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之一。

**关键词:**康德;地域美学思想;《自然地理学》;自然地理环境;鉴赏力的偏离;山区气候;乡愁悲剧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3)06-0063-09

美学史上有一种现象,即不同地域中的人对同一件艺术作品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评价。如南朝梁代诗人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诗句,“江南以为文外断绝,物无异议”,深得包括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在内的南方文人的赞赏,吟咏讽味,不可忘怀;而北方号称“邺下才俊”的卢询祖、魏收等文人却讥为“此不成语,何事于能”<sup>[1]273</sup>?唐初撰写的《隋书·文学传论》在评价南北文风的差别时也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sup>[2]1729</sup>出现这种鉴赏判断上的差异,除了南北对峙所导致的政治分割、交通不便和文人气质、修养爱好上的原因外,因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地域审美观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谓地域审美观,指的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影响下的审美观念。问题是,我们关于地

域审美观的知识如何可能,或者说,我们对人的自然地域审美经验的认识在某种逻辑起点上是合理的。康德下面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致思路径:

就像我们有双重的感官亦即外部感官和内部感官一样,我们也能够按照这两种感官把世界视为经验知识的总和。作为外部感官对象的世界是自然,作为内部感官对象的世界则是灵魂或者人。……对自然和人的经验共同构成世界知识。人类学教给我们对人的知识,我们把对自然的知识归于自然地理学。<sup>[3]157</sup>

在康德看来,灵魂因其不死而具有永恒性,它与上帝、自由意志都是不可认识的对象而自然则是可认识的对象。显然,康德在这里已经抛弃了他的不可知论,承认了包括审美判断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来源于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将认识世界等同于认识“人和自然”,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而肯定我们所有关于世界

收稿日期:2013-03-21

作者简介:钟仕伦(1953—),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知识都来源于人和自然,这就将自然放在了与人同等重要的地位。

按照康德的逻辑推导下去,我们关于世界的审美知识就先验地与自然不可分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获得完整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审美经验的知识,那么我们在以整体思考这一理论对象时便不得不把地域审美观纳入我们经验反思的视界。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康德把认识世界理解成认识“人和自然”的这个观点是在他那本著名的《自然地理学》(又名《自然地理学讲演》)中提出来的事实<sup>①</sup>,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康德将认识人和自然的审美知识与自然地理环境关联在一起的作法,实际上是他建构自己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必然要求。

本文尝试对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对18世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所作的分析、这种分析在他前批判期美学中所占的位置、对他在批判期所建构的美学思想体系又有哪些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试图通过这些讨论来证明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是他重视审美经验的前批判期美学向重视理性分析的批判期美学的过渡,以期引起有关康德美学思想体系的进一步讨论。

### 一 《自然地理学》讲座

康德于1755年回到母校哥尼斯堡大学担任讲师,讲授形而上学、逻辑学、伦理学、自然地理学等课程。他后来在撰写《实用人类学》的时候说,他30多年担任纯粹哲学的教学工作中开设了两门“以世界知识为目的的讲座,亦即(冬季学期的)人类学和(夏季学期的)自然地理”<sup>[4]117,注释①</sup>。康德的《自然地理学》在著名区域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赫特纳认为,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是一部“有名的”地理学著作,它不仅描述了地球,而且“牵涉到人类”<sup>②</sup>。在这部“牵涉到人类”的“有名的”地理学著作里,康德将传统的以描述地球地表形相、植物动物和气候环境为主的地理学改造为描述地球地表形相、植物动物、气候环境与揭示特定地域中的人的种属特征、民族特性、民俗习惯及其地域审美观念相结合的综合性的地理学。他在这部地理学著作中描述和阐释了18世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与审美趣味,表达了他作为人文主义哲学家和批判主义美学家的世界关怀。

1757年,康德写了一个《自然地理学课程》的“纲要与预告”,他在“纲要与预告”中说:“我取材于所有的原始材料,翻阅了所有的藏书,除了瓦伦、布丰和卢

罗夫关于自然地理学的一般理由的著作所包含的东西之外,还通读了一些精明强干的旅行家关于各个国家的最基本的描绘、各种旅行的普遍历史、格廷根的新旅行文集、汉堡画报和莱比锡画报、巴黎科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学院的文集等,以所有与此目的有关的东西构建了一个体系。”<sup>[5]4-5</sup>这些材料的掌握使康德有条件通过那些旅行家和冒险家的记载和描绘,特别是通过画报来考察各个国家和各个区域不同的生活习俗、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即考察那些人们认为“奇异的、非同寻常的、美妙的东西”,借以“说明人们出自自己所生活的地带的爱好,说明他们的成见和思维方式的多样性,因为这一切都能够有助于使人们更切实地了解自己;说明关于人们的艺术、行动和科学的一个简明观念”<sup>[5]10</sup>。这说明康德讲的虽然是《自然地理学》,但他一开始就考虑到艺术风格及其审美趣味的鉴赏力在这门课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实际价值,而康德的这种研究思路除了他本身所具有的受启蒙主义影响的人文关怀以外,还极有可能是受到鲍姆嘉登影响的结果。

康德讲授《自然地理学》的时候,鲍姆嘉登(1714—1762)的《感性论》已经出版。他在哥尼斯堡大学的教学生涯中,不时提到鲍姆嘉登对他的影响。就在上面这个关于《自然地理学》的“纲要和预告”中,康德说:“在上一学期,我应一些先生们的要求做了这种变更,取代了虽然更为基本的、但却更为困难的鲍姆嘉登的说明,以此来满足他们。”<sup>[5]10</sup>过了几年,康德又说:“我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转弯把我主要因为其教学方式的丰富和精确而选择其参考书的那位作者,即A.G.鲍姆嘉登,引入同一条道路”<sup>[5]311</sup>，“我将按照鲍姆嘉登来讲授一般的实践世俗智慧和德性学说这二者”<sup>[5]314</sup>。对鲍姆嘉登的接受从某个方面证明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已经开始考虑到纯粹理性批判与鉴赏力批判之间的关系。

1765年,康德又在《1765—1766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中说:“我将讲授第一个类别的逻辑学(指‘健康知性的一种批判和规定’——引者注)。……在这里,同时材料上非常接近的渊源关系也提供了在理性批判的时候也关注一些鉴赏力即美学的机会,其中一方的规则在任何时候都有助于阐明另一方的规则,而它们的区分也是更好的理解二者的手段。”<sup>[5]314</sup>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前批判时期的康德将“感性完美的科学”与“健康知性”——准确的先天的概念或范畴的领域——相结合的努力,而他将“理

性批判”与“鉴赏力批判”,即美学相互融通的作法作为他批判时期美学理论的基础。康德所理解的“美学”就是“鉴赏力批判”,在我们今天看到的由康德的学生林克整理出版的《自然地理学》中保存着丰富的有关“鉴赏力批判”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康德地域美学思想的丰富性,而且通过这些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基本判断:对各个地域环境中的艺术风格及其审美趣味的考察和批判不仅是康德自然地理学理论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康德整个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 二 “鉴赏的偏离”的阐释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描述到陆地的时候说:

关于亚洲的西藏,更精确的知识会是最重要的知识之一。通过这种知识,我们会获得所有历史的钥匙。这是最高的陆地,也可能比任何别的陆地都更早地有人居住,甚至可能是一切文化和科学的发源地。尤其是印度人的学问就以相当的确定性源自西藏,就像反过来我们的一切艺术似乎都源自印度斯坦一样,例如农耕、数字、下棋等等。人们相信,亚伯拉罕就居住在印度斯坦边界。我要说的是,人类的艺术和科学的这样一个发祥地,很值得花费力气做出更为仔细的研究。<sup>[3]230</sup>

从今天的角度看,康德的某些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例如认为“印度人的学问就以相当的确定性源于西藏”,但考虑到康德关于西藏和中国的知识来源十分有限<sup>③</sup>,这种偏颇也就可以理解。但是,康德在这里把艺术的发祥地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结合起来,“花费力气做出更为仔细的研究”的方法无疑具有特殊的美学研究的意义。

康德在30多年的“纯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生涯中,始终致力于调和经验论与理性论,尽管他的这种调和是在批判期完成的,但是在前批判期的《自然地理学》中,康德已经开始从美学的角度进行这种调和。谢·伊·波波夫认为,康德著述《纯粹理性批判》时,把鲍姆嘉通源于希腊文 *aisthesis* (意为感性知觉)的“美的学说”排除在纯粹理性之外,认为对判断力的批判“只具有经验的性质,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但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判断力批判》中把对美的批判评价也列为“理性的一般原则”<sup>[6]34</sup>。这使康德的美学思想出现了矛盾,美的判断力到底是感性经验的知识还是“理性的一般原则”的知识,这个矛盾在《自然地理学》中已经有所显露。康德说:

至于我们的知识的源泉和起源,我们全都要么是从纯粹理性要么是从经验汲取知识的,此外,甚至理性也在指导着经验。<sup>[3]157</sup>

但是,与其说这是康德美学思想的矛盾,还不如说这是康德在试图以鉴赏力的分析来调和经验论与理性论。康德一方面承认我们的知识既来自纯粹理性,又来自经验;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性高居于经验之上,对经验具有指导作用。在这个基本观点的决定下,康德肯定了人的鉴赏力存在着彼此的偏离。他说:

我在这里把鉴赏理解为对普遍使感官满意的判断。触及我们感官的东西的完美或不完美,我们将从人的鉴赏的偏离看出,在我们这里极其多的东西都基于成见。<sup>[3]318</sup>

康德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给鉴赏下的定义是:“鉴赏是评判美者的能力。”<sup>[7]210,注释①</sup>但“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因而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人们把它理解为这样的东西,它的规定根据只能是主观的”<sup>[7]210</sup>。既然是主观的判断,鉴赏判断就有差异性,就存在“鉴赏的偏离”。

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从眼睛的判断、听觉的判断、味觉的判断和嗅觉的判断列举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因“鉴赏的偏离”而造成的审美的“成见”。例如,“大多数东方民族对大耳朵有一种特殊的乐趣”;“中国人不喜欢我们的音乐”;霍屯督人认为“用红粉笔给自己画出六道纹特别美”;“阿拉伯人用图案给自己的皮肤刺身”;“中国人视之为美的人,高大肥胖,小眼睛,宽额头,短鼻子,大耳朵,如果是男人,就有粗犷的声音和大胡子。……中国少女因童年的裹足而脚大不过3岁孩子。睫毛低垂,从不露手,此外白皙且足够美”<sup>[3]317-318</sup>;“中国金鱼由于优美的金色和其他颜色而为中国人钟爱。它是自然界最美的鱼,手指般长,从头到半身都是红的,其余的部分连同簇状结束的尾巴都是鲜亮的金色”<sup>[3]343</sup>;暹罗(泰国)人“在绘画上,他们像中国人那样画惊人的、纯然不可能的事物”<sup>[3]384</sup>;若开(缅甸)“这个国家的居民给他们的孩子在额头上置一个铅片,以便把他们的额头压宽。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美”<sup>[3]386</sup>;“孟加拉总的来说有很伟大的艺人。他们的画布超越了一切可能的精致”<sup>[3]388</sup>;“明格列利亚、格鲁吉亚和伊梅列利亚是美女的温床”<sup>[3]406</sup>;“波斯人诙谐乖巧。他们非常喜爱诗,甚至根本不懂波斯文的人也喜欢”<sup>[3]396</sup>;等等。康德在这里已经将人物美、色彩美、服饰美、音乐美和绘画美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创造的差异用“普遍使感

官满意的判断”加以描述和阐释,而这些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来自于“鉴赏的偏离”。

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美的判断不需要概念、没有欲念功利和必然引起普遍快感看法不同,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基本上是从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审美观念的影响来展开他的“鉴赏力批判”的。具体来说,康德是从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和影响的人的种属特征及其性格气质、体表形象、生活习俗、民族个性的不同来考察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的差异。如同康德哲学一般是就对象的显现来探索它们的表象及其先天判断的合理性一样,康德所阐释的各个地域环境中的“眼睛的判断”、“听觉的判断”、“味觉的判断”和“嗅觉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涉及到如他自己所说的“完美或者不完美”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合理性问题。由于他的“完美或者不完美”的审美判断带有明显的德意志民族精英意识的痕迹,这使得他自己的鉴赏力判断也出现了“偏离”,而这种“偏离”依旧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经过德国、环绕整个地球的平行线以及这边和那边若干度上,也许是陆地上最高大和最漂亮的人”<sup>[3]310</sup>。

康德所描述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物美、音乐美、色彩美和绘画风格上的“鉴赏的偏离”,实际上是地域审美观念使之然。地域不同、习惯不同、人种不同、民族习性不同自然带来不同的鉴赏力判断。在康德看来,这种“偏离”的基础建立在“普遍使感官满意的判断”之上。也就是说,美的判断具有“理性的一般原则”——康德后来把它表述为与知性为认识能力制定先天气则和理性为欲求能力制定先天规则一样的由判断力为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制定的先天规则<sup>[7]177</sup>——的特点。本来美的判断不需要借助知解力和概念,美的对象既然是引起普遍快感的对象,它就应该使人对同一个对象表现出同样的美感,但就不同地域环境中的人来讲,未必能够达到此目的。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出现的这种鉴赏力的“偏离”,其实是他们所生活的“外部感官对象”,即自然界所决定的。因此,这种“偏离”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理性给予我们纯粹的理性知识;但我们却是通过感观获得经验知识的。不过,由于我们的感官并不超出世界,所以我们的经验知识也只是延伸到当前世界”<sup>[3]157</sup>。按照康德“认识世界就是认识人和自然”的逻辑,“当前世界”包括了当下的人生活在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也就是说,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人或

者一个民族特殊的审美鉴赏力,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鉴赏力的形成首先受制于他所生活的自然地理环境。

康德对“鉴赏的偏离”的阐释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虽然美的判断依据人的主观情感,这种主观情感对美的判断具有一般的理性原则,即同一个美的对象的判断对所有人在“愉快与不愉快”基础上的判断具有普遍一致性,也就是他后来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讲的“鉴赏判断本身就带有审美的量的普遍性,那就是说,他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这种“普遍的有效”表现为“普遍赞同”<sup>[8]261-262</sup>。但是,在受到特定自然环境和自然气候所决定的人种族属、性格气质、生活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下,一个美的判断也会出现“鉴赏的偏离”。这说明在审美实践中,美的判断除了受制于主观的情感因素的制约外,还受制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

### 三 山区气候与乡愁悲剧

除了对“鉴赏的偏离”进行阐释外,康德还在《自然地理学》中研究了不同气候条件下人的性情气质及其对美的判断能力。他认为,“冷淡麻木的气质,纯粹是长期居住在寒带影响的残余”<sup>[5]446</sup>，“在热带,人在所有部分上都成熟更早,但未达到温带的完善性”<sup>[3]314</sup>，“温带,尤其是温带中间部分的居民比世界上人的任何其他种属身材都更漂亮、更勤劳、更诙谐、在其情欲方面更节制、更有理智”<sup>[3]316</sup>。康德之所以作出这种判断,其原因在于“人是为整个地球创造的,而且正是由于人的身体由大自然如此构造,以至于他通过适应每一种气候而即便是气候极为不同也能够居住,也许部分地产生出不同的民族个性”<sup>[3]238</sup>。很显然,康德在这里所阐释的气候影响人的观点与孟德斯鸠(1689—1755)的观点一脉相承<sup>④</sup>。

孟德斯鸠于1748年发表《论法的精神》,强调气候影响人的体质结构和性格感情,从而影响人对社会的看法,而立法者的责任是尽可能地消除这种影响。他认为,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情感气质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地域决定不同的审美情趣。他以歌剧为例说:“我看过英国和意大利的歌剧,同样的剧目,同一批演员,可是音乐在两个国家所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一个静如处子,一个动如狂汉,真是不可思议。”他甚至认为,北方气候寒冷,“人的恶习少而美德多”,温暖地区的人“恶习无常,美德也无常”<sup>[9]273-274</sup>。孟德斯鸠这种“关于人类从属于自然的见解”<sup>[10]185</sup>,不仅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而且对美学和人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德是受其影响最为明显的一位美学家。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有一段关于山区气候与乡愁悲剧的分析集中体现了他的地域美学思想。康德从山区的自然气候、稀薄的空气、肌肉的疲劳现象以及生产和生活资料的缺乏推导出山区地域环境影响人的两个后果:一个是性格气质,“围绕山以及在山上居住的人们十分强壮和勇敢,并且力图以所有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自由”<sup>[3]246-247</sup>，“在山区,人们坚韧、活泼、勇敢,热爱自由和其祖国”<sup>[3]316</sup>;另一个是乡愁悲剧,“据说山区的空气是乡愁,特别是瑞士人乡愁的原因,因为瑞士人如果来到别的国家,特别是在听到其民族歌曲时,就变得郁郁寡欢,甚至当人们不允许他们返回故乡时因此而死”,但康德同时又认为产生乡愁甚至悲剧的“另一个根据在于同一些人因养家糊口而必须花费更大的力气”<sup>[3]247</sup>。他说:“瑞士人的乡愁是意识到不可能时的一种渴望或者一种追求。……但正因为此,再没有比意识到不可能达到目的时竭尽全力而更让人难受了。”自然环境的恶劣使人的生活变得十分简单,而“生活越简单,心灵和欲望的冲动就越强”<sup>[3]248</sup>。过了四十多年,在康德写完他的“三大批判”以后,依然坚持这一观点:

在瑞士人(而且如我从一位见多识广的将军口中听到的那样,一些地区的威斯特法伦人和波莫瑞人也一样)被安置在别的州时侵袭他们的乡愁,是通过唤回其少年时代的无忧无虑和邻里聚会的景象而激起对他们曾享受的非常质朴的生活乐趣的那些地方的一种渴望的结果,……这种乡愁侵袭一个缺少钱财,但却通过兄弟关系和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行省的那些乡下人,要甚于侵袭忙于赚钱、把 *patria ubi bene* [活得好的地方就是祖国] 当作座右铭的人。<sup>[4]171</sup>

这实际上已经将“悲剧的诞生”放在由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土壤上来考察了。康德所阐释的生长于瑞士山区的人的乡愁甚至悲剧形成的原因,体现了康德地域美学思想的独到之处,这就是以人为中心,虽然重视人地关系,但并不单纯从自然地理环境出发,强调自然地理环境的决定性作用,而是结合人的现实生存社会环境,尤其是受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的情感来分析某一个地域中的审美意识。这使得他的地域美学思想克服了孟德斯鸠气候环境决定论的缺陷而显示出完美的批判色彩,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人地关系及其美学

思想和阿尔夫雷德·赫特纳提出的“美学地理学”提供了批判的对象。

康德关于“山区气候与乡愁悲剧”的阐释对我们认识先秦时期秦国的“高上气力”和屈原的悲剧不无启发意义。从秦地出土的直首竖尾、四肢卷曲、虎视眈眈的阳陵虎符和气势恢宏的秦故都雍城布局以及《诗·秦风》中可以看到,先秦时期的秦国是一个崇尚武力、以“尚首功”为最高荣誉的国家,秦民族也是一个“手可裂虎兕”的民族,而这种民族精神来自于秦国的地理环境。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关中沃野千里,民好稼穡,“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sup>[11]3261</sup>。班固也说,秦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携行’”<sup>[12]1644</sup>。地处山林、迫近戎狄的地理环境使秦民族从一开始就以“十分强壮和勇敢,并且力图以所有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自由”的民族个性登上“争于力”的历史舞台,并最终成为扫荡六合、一统天下的强国。而作为秦国地域审美意识表现的《诗·秦风》也以车马兵戎、尚武田狩为主题,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sup>[13]卷四《三都赋序》</sup>。

屈原怀抱选贤任能、强楚一统的政治抱负,以九死未悔的精神上下求索,终至“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的悲剧也是“意识到不可能时的一种渴望或者一种追求”。另一方面,屈原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彪炳千秋、感动天地的具有浓郁荆楚地域色彩的作品,其原因在于“江山之助”和他“心灵独有的安宁”共同作用的结果。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讲到“三楚”之地的物产及其风俗习惯时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sup>[11]3268</sup>司马迁的记载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里的“好辞”与他在《史记·屈原列传》中称扬屈原“娴于辞令”和“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的“好辞”的意思一致,大概是说语言的华美和注重修辞的口才,而“好辞”是作赋的前提。

屈原和他的弟子皆为南楚之人,故《隋书·经籍

志》有“宋玉、屈原,激清风于南楚”<sup>[2]1090</sup>之誉。刘师培也以为“水道交通有数益焉。输入外邦之文学,士之益也;本国物产输入外邦,商之益也;船舶交通,朝发夕至,行旅之益也;膏腴之壤,资为灌溉,农之益也”,“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sup>[14]</sup>《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楚有江河湖泊之利,物产丰富,水利交通较北方发达,所以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交通发达带来文化交流的频繁和人际交往的增多,由此出现“好辞”的社会现象。作为“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的屈原,不会不受到“南楚好辞”之风的影响。后人以“楚辞”来命名屈原及其弟子的作品,“南楚好辞”的地域文化色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事实上,班固就这样看。《汉书·地理志》说楚国:“信巫鬼,重淫祀。……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sup>[12]1666-1668</sup>如果说司马迁所讲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指的是楚国的自然气候对楚人自我繁衍的影响,那么班固所讲的“信巫鬼,重淫祀”则是指楚国的社会习俗。但是,二者有着内在的关联。“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自然气候决定着楚人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楚人好巫、家为巫史的现象又来自对死亡的恐惧所产生出来的对死亡的超越。

从康德的论述可以看出,瑞士人的乡愁和悲剧意识,无不受到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使艺术作品浸染上鲜明的地域审美观念。地域审美观念不是单纯的乡土观念,与所谓的“地域色彩”也有所区别。地域审美观念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人们头脑中的审美创造性的反映,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只有当作家或艺术家观念地改变着自然界和把改变的自然界纳入自己的创作思维时,才能形成地域审美观念。从理论形态上看,地域审美观念是一个集合式的同心圆。如果从整个地球来看,一个大陆可以有围绕这个大陆中心所特有的审美趣味,例如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阐释的欧洲大陆与亚洲大陆的地域审美观念;而每个大陆中的国家又有这个国家因疆域而形成的独特的地域审美观念,一个国家中由于区域环境的不同又培育出各不相同的地域审美趣味。康德在上面所列举的各个大陆、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格以及山区气候与乡愁悲剧之关系的分析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黑格尔所比较的古希腊的道芮斯、伊俄尼亚和科林特三种柱式<sup>⑤</sup>,以及中国古代的齐鲁、燕赵、秦晋、巴蜀、吴越地区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的差异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 四 地域环境与审美趣味

从康德的美学思想中可以看到,他在试图用审美判断力来弥合人的认识能力和人的欲望能力之间的鸿沟时,并没有忘记审美经验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的《自然地理学》中发现,他所阐释的“鉴赏的偏离”及其产生这种“偏离”的“普遍一致性”,实际上成为他关于“判断力批判”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

邓晓芒认为,康德的整个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立场。“正是由于这种人类学的视野,才使康德在把他的眼光放到作为人类学一部分的美学中来时,具有远远超出就事论事的经验派美学家们和脱离人而构思的唯理派美学家们之上的敏锐性和深刻性。……可见,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探讨他在《判断力批判》中所涉及的美学思想,不论对理解他的《判断力批判》还是对理解他的美学,都是极其重要的”<sup>[15]3</sup>。邓晓芒指出的康德美学思想的人类学特征无疑是正确的。其实,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正是他在地理学研究的人文转向中以人类学理论体系和自然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来展开研究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自然地理学》实际上也可以被看成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专著。但我们更想说的是,康德的人类学思想与他的美学思想都离不开他的自然地理学思想,就像他的太阳系起源的天体演化假说之于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思想一样,他的地域美学思想是他建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也是他重视审美经验的前批判期美学向重视理性分析的批判期美学的过渡思想。因此,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涉及到的地域美学思想对于理解和掌握康德的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再注意到当代中国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以及文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也是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提及<sup>⑥</sup>——的探讨,康德《自然地理学》的美学思想就更值得我们去发掘了。

黑格尔在评价康德美学思想的时候说,康德“由于把自然和艺术中的美的对象,和适应目的的自然产品联系起来,康德接近于了解到有机体与生命的概念,不过他考虑这些对象和产品,却纯粹从判断它们

的主观方面的思考着眼”<sup>[16]71</sup>。这样的思考使得康德在面对同一个审美对象时往往从主观方面来进行审美判断。在《自然地理学》中,康德曾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埃特纳山的高处,人们极舒适地尽情眺望世界,不仅望到墨西哥城,而且望到整个地区和西西里岛。这类山上的纯净空气也使得人们从这里观看比能够设想的还更壮观和更美得多的星空。但这样的地区的居民多半像埃特纳山附近的居民一样对这样的刺激无动于衷。”<sup>[3]257</sup>我们没有材料证明到底是康德在这里描述的“星空”的审美差异引发了康德关于美的判断需要建立在有修养的心灵之上的“普遍的正确性”的理论,还是恰恰相反,但康德以及他所提到的“山区居民”对同一个美丽的星空所产生的审美差异却正好揭示出一个有关地域美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即地域审美观念的形成与判断力的形成一样,需要有一定的心灵修养和掌握审美的普遍的正确性。

由康德我们知道,审美判断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鉴赏力判断。在审美判断中,只要夹杂着极少的利害感在里面,那就不是审美判断,而是一个认识能力的判断,或者是一个欲求能力的判断。但是在实践中又的确存在着我们对同一个对象表现出不同判断的事实,康德自己也指出过这个事实。他说:

如果有人来问我,对于眼面前看到的宫殿我是否发现它美,我固然可以说:我不爱这一类徒然为着人们瞠目惊奇的事物,或是,像那位伊诺开的沙赫姆(美洲土人酋长——译注)那样来答复,他在巴黎就没有感到比小食店使他更满意的东西;此外我还可以照卢骚的样子骂大人物的虚荣浮华,不惜把人民的血汗浪费在这些无用的东西上面;最后我还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假使我在一个无人住的岛上没有重新回到社会里的希望,即使只要我一想念就会幻出一座美丽的宫殿,我也不愿为它耗费这种气力,即使我已经有了一个住得很舒适的茅屋。<sup>[8]250-251</sup>

在对宫殿的表象进行判断的时候,这里面如夹杂着利害关系(小食店,欲求的嗜好以及温饱)或道德感(人民的血汗,大人物的虚荣浮华),这种判断则不是审美判断。如果是审美判断,则必然涉及到审美趣味问题。

审美趣味指的是对审美对象的享受并判断其价值的的能力。康德在启蒙主义影响下,从人的本源共同性出发,建立了审美趣味的普遍有效性,即如果对象对感官来说属于客观的感觉并联系着情感,则这个对

象给与感官的审美趣味就具有主观的客观性——对一切人来说这个对象都是美的对象。也就是说,审美趣味首先是建立在对象的客观有效性和主体的普遍有效客观性上。因此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域具有共同的审美趣味——如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描述的各个地域中的审美趣味——或者说是审美的“成见”。

在地域美学的语境下,没有“好的审美趣味”、“高尚的、正确的审美趣味”之说,只有不同的审美趣味的区分。我们不能说在康德生活的那个世纪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和“不露手臂”与欧洲贵族妇女的鲸骨雕花束胸装谁美谁不美,谁的审美趣味正确或者不正确,谁的审美趣味低下或者高尚,因为这些各自保有的审美时尚是那个时代各自的民族个性,是她们美化日常生活的结果,自然也是她们的地域审美趣味的结果。

我们之所以强调特定地域环境中的审美趣味首先建立在对象的客观有效性和主体的普遍有效客观性上,其根本原因在于康德所讲的“一个具有客观的普遍有效性的判断也往往是在主观上有效而已,那就是说,假使这判断对于包含在某一概念里的一切是有效的,那么它对于每个用这概念来表示一个对象的人也是有效的”<sup>[8]260</sup>。也就是说,相同时间的不同空间下每一个独立存在的地域环境就是一种共同的审美趣味产生的根源,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环境中的人因为拥有共同的“心意状态”而有着相同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虽然说是每个人从心中对这个地域环境的各种表象得出的鉴赏判断,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他所生活的这个地域环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地域审美判断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内作为客观判断的全体共同的审美趣味,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意识。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部落、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它们没有高下之分,只有“鉴赏的偏离”和“审美的成见”。

## 五 余论

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从受自然地理环境制约和影响的人的种属特征、性格气质、生活习俗等视域考察了18世纪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的鉴赏,在孟德斯鸠“人从属于自然和气候”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他的地域美学思想体系。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是他前批判期的美学思想的代表,也是他整个美学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在《自然地理学》中所阐释的受地理环境决定所产生的艺术风格和审

美趣味的差异、鉴赏力的偏离、山区气候和乡愁悲剧的关系等有关美学思想,为他在批判期所作的《判断力批判》奠定了实践经验的基础。《自然地理学》中所作的美学阐释,大多是审美判断的经验的阐释,这些阐释审美经验的观点在《判断力批判》中得到理性批判的升华。正如康德自己所说:“审美判断之经验的解释常常可以作为开始,把材料收集起来供给一个较高级的考察。”<sup>[8]324</sup>如果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较之于《自然地理学》是对美学的“一个较高级的考察”的话,那么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美学思想,比如,审

美判断力出自知解力与想象力的自由活动,美是不借助概念和知解力而被感觉为一种引起普遍快感的对象等等,几乎都可以在康德的《自然地理学》中找到理性批判的萌芽。特别是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指出的“鉴赏的偏离”和鉴赏是“对普遍使感官满意的判断”的思想,不仅成为他批判期美学着重研究的对象,而且以其所蕴含的人与自然环境、普遍与特殊、目的与手段、概念和对象的融合而成为地域美学思想的重要基础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康德的《自然地理学》是地域美学思想的一部奠基之作。

## 注释:

- ①参:林克 1802 年所写康德《自然地理学》的“编者前言”。康德在描述到欧洲大陆的意大利时提到,“1751 年,皮埃蒙特诸山之一成为一座喷火山”,这可证明康德的《自然地理学》著述于 1751 年之后和 1802 年之间。这个期间,康德完成了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7)、《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判断力批判》(1790)。
- ②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认为:“在主要论点上,格尼斯堡哲学家康德的有名的《自然地理学讲演》基本上是赞同这两部著作(指荷兰地理学家吕洛夫斯的《关于地球的数理的和自然的知识导言》与瑞典地理学家托·贝克曼的《关于地球的物理描述》两部著作——引者注)的,不过这些讲演也牵涉到人类,并且以附录的形式写了一个简短的地志。”〔参见:(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6 页〕。
- ③在康德撰写《自然地理学》的时候,关于中国和西藏的知识在德国少得可怜。康德《自然地理学》的编者林克在“附释”中说:“关于中国,即便是按照最新的游记,我们确知的也不到一半。……马戛尔尼到中国的旅行几乎根本没有扩展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知识,而只是使得神话般的传说广为流传。”而关于西藏的知识则是通过乔治的《西藏词典》(罗马,1762)、塞缪尔·特纳的《出使西藏大喇嘛宫廷记》(伦敦,1800)等著作“获得许多启蒙”(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9 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第 234 页)。
- ④有两个理由证明,一个是孟德斯鸠于 1748 年发表《论法的精神》,康德的《自然地理学》写作于 1751 年之后;另一个是康德自己在《自然地理学》中论述到热带人和温带人的不同特征时说:“孟德斯鸠完全正确的判断,正是使得印第安人和黑人如此惧怕死亡的那种娇嫩,常常使他们比惧怕死亡还更加惧怕欧洲人能够经受的许多东西。”(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9 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第 315 页)
- ⑤黑格尔指出:“建筑风格上的差异最突出的表现在柱子上面,我们在这里只提各种柱式的主要特征。最著名的柱式有道芮斯、伊俄尼亚和科林特三种,这些柱式在美和符合目的性两方面不但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77—82 页〕朱光潜先生在翻译时有个注解:“道芮斯(Doris),希腊北部的小山城;伊俄尼亚(Ionia)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上,古希腊的殖民地;科林特(Corinthia)在希腊北部一个半岛上。这三种古典建筑的风格差异主要从柱式上见出。”黑格尔所指出的道芮斯柱式的“严肃的、朴质无华的男人气概”、伊俄尼亚柱式的“苗条和秀美动人”、科林特柱式的“细而长,雕饰得更富丽,显出更高的审美趣味”以及它们各自在柱高与粗度的比例关系上不同而给人形成的美感不同外,还受到它们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即山地、海岸和半岛的制约。
- ⑥“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概念也是最早由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提及:“历史涉及就时间而言前后相继地发生的事件。地理学则涉及就空间而言同时发生的现象。后者按照研究的不同对象,又获得不同的名称。据此,它时而叫做自然地理学、数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时而叫做道德地理学、神学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或者商业地理学。”(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 9 卷《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第 162 页)康德在这里提及“文学地理学”的事实证明,康德承认在特定地域里发生的文学现象也是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之一,而文学是审美意识的形象化反映,也就是说,康德把地理环境中的审美意识纳入到自己的批判视域进行研究,从学科层面表现了康德的地域美学思想。

## 参考文献:

- [1]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 逻辑学、自然地理学、教育学[G]//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4] 学科之争、实用人类学[G]//康德著作全集:第7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5] 前批判时期著作Ⅱ[G]//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6] (苏联)谢·伊·波波夫.康德和康德主义[M].涂纪亮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 判断力批判[G]//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8] (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宗白华全集:第四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徐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0] (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M].王兰生译.张翼翼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1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3] 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5] 邓晓芒.冥河的摆渡者——康德的《判断力批判》[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 [16]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On Kant's Regional Aesthetics

ZHONG Shi-l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6, China)

**Abstract:** Kant's regional aesthetics is fully demonstrated in his *Physical Geography*, in which starting from the geographically influenced characteristics of certain species, one's character and temperament, one's life style and custom, Kant does a survey on the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interests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18th century. Kant's regional aesthetics is based on Montesquieu's belief that man is subjected to nature and climate. Regional aesthetics,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is aesthetic system, is the transition from pre-critical period of aesthetics to critical period of aesthetics. All his thoughts expressed in *Physical Geography*, such as the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interests are influenced b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ppreciation is the satisfied recognition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untain climate and nostalgia tragedy, laid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Critique of Judgment*. Thus, *Physical Geograph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orks in Kant's aesthetic system.

**Key words:** Kant; regional aesthetics; *Physical Geography*;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he deviation of appreciation; mountain climate; nostalgia tragedy

[责任编辑:唐 普]